

# 汉学家怎样向世界讲中国故事

——评朱振武“中国故事英语传播三部曲”

肖尘依莹



《他山之石：汉学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英语传播》  
《中学西渐：汉学家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英语传播》  
《归异平衡：英语世界汉学家的中国故事书写》  
朱振武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6年，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翻译家朱振武采访了英国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期间闵福德谈到母亲招待贵客时要拿出最好的瓷器(china)，因此他翻译中国文学典籍也要“take the best china”(呈现最好的中国)。这句话可以概括许多当代汉学家研究与译介中国文学文化的宗旨。朱振武长期关注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与海外汉学研究，近期，他的新作“中国故事英语传播三部曲”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总共约150万字，以中国学者的视角系统梳理和评讲了汉学家在英语世界的中国故事书写历程，并且提出了文学翻译的归异平衡理论，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中国故事在英语世界如何传播与流通？汉学家在这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三本著作引领读者赏鉴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个中真諦。

## 博闻今古织经纬，纵览中西释汉英

“中国故事英语传播三部曲”包括《他山之石：汉学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英语传播》(以下简称《他山之石》)、《中学西渐：汉学家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英语传播》(以下简称《中学西渐》)和《归异平衡：英语世界汉学家的中国故事书写》(以下简称《归异平衡》)。由点及线地梳理了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历程，根据不同作者、译者、译本之间的关联与比较，钩织成网，以展现汉学家用英语书写中国故事的全貌，并对归异平衡的翻译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多向度、全方位的探讨。

三部曲贯通古今，联系中西，既相互独立，又有内在关联。其内容架构充分体现了中国学者的主体性与中国文学文化的自知、自觉与自信。具体而言，《中学西渐》聚焦中国古代文学，按照古代诗文、短篇小说、章回小说、史传文学、戏剧与说唱文学等文类划分章节；《他山之石》则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选取了鲁迅、沈从文、路翎、钱锺书等现代作家与莫言、苏童、阿城、严歌苓、吉狄马加、余华、迟子建、洛夫、王安忆、叶兆言、王小波、麦家等当代作家为研究对象；而《归异平衡》涵盖中国古今小说，同时开辟了“先锋作家余华”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两个专题，并关注了中国港台地区与海外华语文学的代表著作。

在对汉学家的群体书写上，从19世纪出生的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到1978年出生的新生代学者米欧敏(Olivia Milburn)和陶建(Eric Abrahamson)，聚焦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尼日利亚的48位国际知名汉学家，考察他们的成长背景、治学思想、代表作品、翻译动机、译介策略和传播历程。西方汉学家们既是文学作品的译者，也是评论者和研究者；既是翻译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也是作品推广的策划人和代言人。他们兼具多重身份，秉持着对中国文学文化的热爱，是中国文学对外推广的代表。可以

## 意味书屋

# 让春节的悠长、丰富，生长在我们的生活中

蔡怀冰



《春节简史》  
张忠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年三十晚上，大人要给我们三个人‘压岁钱’，装在红纸袋里，写上长命百岁，放在枕边，还要在我们每个人的景泰蓝食盒里放上用粘米面做的如意、小柿子、橘子等食品，大年初一我们一醒来不许说话，先要用手摸摸这些东西……”这是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女孔德懋在《孔府内宅轶事》中写下的话，转引在《春节简史》中，为了这本小书，民俗学者张忠春先生积累了十余年。

这样的细节，意外又不意外。意外的是，给“压岁钱”这样的琐事，前辈做得如此认真、细致。据《春节简史》所引《春采采风志》，压岁钱须“以红绳穿钱作龙形，置于床脚”，初期非真正的货币，而是“浇铸成钱币的样子，正面上有‘万寿千秋’之类的图案，或者出以龙凤、玄武等图纹，那是长辈赠予的作为佩戴的品物，用以压邪驱魔的”。

不意外的，是通读《春节简史》即知，类似的“繁琐”似是前辈们的生活常态。“繁琐”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他们的“朋友”。以除夕为例，便有如此多的、“必须做”的项目：

**贴窗花：**书中引用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名句“华山玫瑰燕山龙”，距今6000余年的华山彩陶上，分明绘有玫瑰图纹。就像“龙的传人”，花朵也是民族记忆，是华人之称的来源。  
**贴门神：**至少有五种以上的组合。  
**贴年画：**模式化，却不会引发审美疲劳。  
**贴春联、春牌：**不分乡村与都市，皆有此俗，虽是仪式，却包容了幽默、率性的内容。  
**祭祖：**除夕下午的重要活动，称为“辞年”。  
**团圆饭：**游子不论多远，都会尽可能赶回家，不错过它。饭后还有宵夜，即糖果点心组成的“压岁钱”。

**守岁：**又称熬年、熬年，出自原始庆祝，已成最重要的习俗。  
**压岁钱：**体现长辈对晚辈的关爱。  
**给压岁钱：**“采用松柏枝之大者，插于瓶中，缀以古钱、元宝、石榴花等，谓之摇钱树”。  
考虑到春节前便是一系列的“规定动作”，从“大如年”的冬至开始，过年气氛开始升温，此后是腊八节、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南方是腊月二十四)，接着是扫房子、磨豆腐、宰年猪等……正月一个月是腊月，腊即祭，亦指祭祀用的干肉或腊肉。  
除夕后，更多的活动扑面而来：初一拜年，初二拜财神；初三扫房子；初四是“羊日”，吃“折箩”(酒席后的剩菜)；初五是“牛日”，“破五”吃三桌半；初六是“马日”，“送穷神”；初七是“人日”，吃“盘菜”“咬春”；初八是“谷日”，顺星，燃小灯笼之；初九是“天日”，玉皇大帝生日；初十是“地日”，老鼠嫁女，烧旧物；正月十一是“子婿日”，老丈人宴妻姑爷；初十二搭灯棚；初十三关帝升仙，开灯；

初十四点长夜灯；初十五是元宵节；初十九是燕九节，纪念丘处机；初三十雍和官看打鬼……春节才算结束。  
相信很少有现代人会去完整操练这些项目。单独看任何一项，都不“过如此”之感，串成整体，我们才能意识到，“春节”不只是一个节点，而是一个悠长、丰富的过程，它是生活的常态，而非异态。  
在古人看来，时间不是线性向前的，而是像春夏秋冬那样，无限循环。今天的一切，终将与我们重逢，这是轮回中一份值得珍重的缘分——以喝水为例，现代人会用一次性纸杯，看重的是“喝的结果”，一旦喝完，无人关注纸杯的下场，彼此再无交集；前人则愿把时间花在杯子上，许多杯子精工细刻，完全是工艺品，他们更在乎“喝的过程”。  
喝水是小事，却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们。  
使用纸杯的人们，习惯于“用后即弃”，世界变得功能化起来，个人感受、情感成了可有可无的配角。万物如容器，它们存在的唯一意义是“被使用、被消耗、被抛弃”。世界必须配合我们不断扩张的欲望，否则我们就会觉得，它背叛了我们。这将我们以焦虑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会埋头刷几个小时的手机，却为开机速度延迟几秒而烦躁。  
使用工艺器材的人们，则会主动去寻找并建立意义，试图与世界和解。  
老舍先生的儿子、作家舒乙曾说，作家赵树理喝酒，是“纯粹赶大车的”方式——去一家酒馆喝一杯上路，途中见有意思的酒馆，便去喝一杯。“车把式”的工作重复且枯燥，他们便将它“游戏化”，使其成为一个发现、惊喜之旅，一次次都不同。赵树理下班后，也常这样一

路喝下去。  
前人过春节，与之类似，未必真的专注哪个具体项目，但一项项经历下来，春节就变得生动了——它们开始围绕着我们的心灵而舞。  
近年来，不乏“生活需要仪式感”的呼声，以“重要的不是你信仰什么，而是你总要有个信仰”为借口，太多“为仪式感而仪式感”的“伪仪式”挤入生活。但自造仪式感，难免落入“融入仪式，获得自我”的幻觉，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表演，其悖论在于，不断异新则难持久，而持久则难新异。不断在传统中“挖掘”与“开新”，就会走向“消费传统”。在汉服、古诗词、古人生活方式等“热”的背后，许多操练者并未真正摆脱“用后即弃”的思维模式，成了消费主义的延伸，而非传统的延伸。  
读《春节简史》可知，传统并不是条文规章，不是脱离真实生活的臆造与模仿，不同地区、不同人可以有自己的取舍和理解，它是“长出来的”，而不是“嫁接上去的”，它有内在的生命力，它来自前人的信仰——一切过程都是有意义的，在“有用”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等待着我们去相遇。  
那么，这个传统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充满敬意地去生活”，这也是我从《春节简史》中得到的感悟——敬意让细节丰富多彩，激活了它们内蕴的趣味。由此可知，为什么从冬至到春节，会由一个个祭祀构成，而从春节一直延伸到正月三十日，每天都有新主题，它们不是“非此不可”，而是像赵树理先生下班之路上的那些小酒馆们，让重复的每天也变得新鲜。  
“年味”是找回来的，有趣者得之。读《春节简史》，则可增趣。



鱼焦了需读书礼记

# 前有聊斋后封神

读王兆军的新作《蚂蚱》

陈思和

在当代文学史上，王兆军是一个难以被忘却的作家。曾记得上世纪80年代全国文学创作评奖，有一届他的中篇小说《拂晓前的葬礼》和报告文学《原野在呼唤》双双入选。此奖为鲁迅文学奖的前身，能获得如此殊荣的作家，当时不多，现在也少见。何况80年代风清气正，此奖赢得舆论界一片赞扬之声。我与大老王是复旦中文系同班同学，虽然天南地北我们交往不多，但对他的创作成就，一向深以为自豪。就这样时间一晃过去几十年，转眼我们都已经是古稀老翁，到了含饴弄孙之年，然而最近我又读到了他的长篇新作《蚂蚱》。

大老王是山东临沂人氏，其小说写的蚂蚱庙村，应在他的家乡鲁南地区，扩大点说，也影射了整个黄淮地区。小说故事从光绪二十六年一场特大蝗灾写起——这场蝗灾好像莫言在《红蝗》里也描写过，但那只是一个楔子，就像《水浒》里洪太尉误走妖魔，进入正题所描写的，似乎与蝗虫并无太大关系，蝗灾也就成了一个文学意象。《水浒》描写的天罡地煞象征了洪太尉放走的妖魔，至于如何“妖魔”？怎样“误走”？那只能靠读者的想象。照这样子看来，作家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不写蝗虫，又处处写蝗。蚂蚱神庙村里的芸芸众生，生生死死的挣扎、毗牙瞪腿的折腾，蝗灾也。

小说描写的蚂蚱庙村史，从辛亥年开始，到己丑年为止，影射了整个民国历史。不过在我看来，作家并不着意于再现历史，全书注明历史记载的年份，也就是1911、1938、1949三个年头，其余叙述时间模糊一片，暗合了我曾发现的一个文学叙事特征：民间叙事。我在讨论贾平凹小说时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民间说史没有明确的年份，假作真时真亦假，只讲故事的完整性，而不讲时间的连续性。如书中写到辛亥第二年，贾三福去探望县城里混事的革命党人赵建章，办公处墙上挂孙中山的画像，口里讲的是三民主义，后来几次写到新政权依法办事，甚至写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这些都应该是发生在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权下的故事，而不是辛亥年末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的那一两个月。作家这么写，是说明蚂蚱庙村的农民根本没有搞清楚北洋军阀政权和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区别，也无视这些政权的存在，他们记忆里只有与村里有关的事件，除此以外，无非交纳税粮抽壮丁，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小说在大叙事上锁定了民国时期，而在具体的琐碎的村史叙述上，采取了民间说史的方式，两者的交集和错位，构成这部小说第一个有趣的看点。

其次，小说又一个看点在于贯穿全书的人物贾三福。此人在小说叙事上扮演了独特的角色。我先分析小说的两个章节：第一，结尾一章写了神庙里有壁画，画的是蚂蚱封神，画中诸佛性、文学性与思辨性。三部曲的文字练达且富有韵味，蕴含哲理而深入浅出，其内容全面展现了西方汉学家传播中国文学经典的译介历程、跨界实践与宝贵经验，亦是对朱振武所提出的归异平衡理论的内涵诠释与实践应用。三部曲的成书出版既为中国文学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也为中国翻译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作出了新的贡献。

除正文外，书中还有汉学家主要著译中英对照表、姓名中英文对照表、参考文献与索引目录等材料供读者参照，史料详尽。  
学术著作常因学理艰深或语言晦涩而使得受众面有限，但是朱振武的“中国故事英语传播三部曲”兼具了学理性与趣味性、文学性与思辨性。三部曲的文字练达且富有韵味，蕴含哲理而深入浅出，其内容全面展现了西方汉学家传播中国文学经典的译介历程、跨界实践与宝贵经验，亦是对朱振武所提出的归异平衡理论的内涵诠释与实践应用。三部曲的成书出版既为中国文学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也为中国翻译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作出了新的贡献。

叙事结构上，《蚂蚱》不似《水浒》那样具有浩浩荡荡、百川归海的目的性，它更接近《封神演义》那样让神仙世界与现实世界并行的结构，不过《蚂蚱》不是神话故事，所以神话世界的叙事线索都被隐藏起来，只是在现实叙事的缝隙里时隐时现，最后则以封神异象来暗示其结构的两重性。这在民间叙事里也是很普遍的现象。从叙事形态而言，《蚂蚱》的通篇叙事接近于《聊斋志异》。蒲松龄也是山东人，一个民间故事的讲述高人，鬼神世界与人间世界被他揉成一团，浑然难分。《蚂蚱》犹如一部被短篇连载起来的现代聊斋，作家写云舒(何仙姑)受高人指点陷污泥而不染；写宋氏女为爱奋不顾身终于沉沦；写何氏女被乌鸦复仇；写益贩兴邦在土匪抢劫面前裸身嚎叫、绝望咒天，终于脱险；写徐和尚的猥亵、林守典的迂腐、赵树的我行我素、宗申的软弱失节(风中芦苇)，各有其精彩故事。这些故事都来自民间乡土，似真似幻，玄魂迷人。

一部当代小说，就这么远远地来到我们的眼前，带着历史文化的信息，从黄土深处、从神话传说、从宋元平话、从明清说部……对了，还有一点不能不说，大老王在《蚂蚱》里并非纯然发思古之幽情，传统文化美学是小说的叙事表征，但深入小说肌理的，依然是新文化传统的批判因子。看那小说的几章节描写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的死水微澜，弥漫了鲁迅创作《阿Q正传》《风波》的气息，作家作为小说叙事人，经常撇开贾三福的衣冠形体，忍不住露出真身，画龙点睛地发表议论，月且蚂蚱庙的种种人事，那又是现实战斗精神的昂扬了。



陈思和，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文学评论家。

今小说文脉而细细品尝《蚂蚱》，人间一大快事！

这样就回到本文的题目上了。《蚂蚱》为读者树立一个古今贯通的创作典范。这部小说里埋了许许多多的梗，无不通向古典文学汪洋大海，源头是那样的浩瀚恣肆，以致于每个小说元素都浸淫过传统美学的营养。我前面说到它的叙事具有道各各路神仙以及许多蚂蚱，一夜之间都被标上了村中人氏名字，每个村民都被封神，而独缺了贾三福。在《封神演义》里，封神者自己没被封神，因为他本来就是神仙下凡，就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姜子牙。以此推理，蚂蚱庙村的封神者，贾三福无疑。第二，那么这个封神者当了什么角色？小说开篇几章介绍贾三福的种种故事，到第七章写赵建章(最高政权的象征者)约了三福一个过时的名号：约地，即乡约地保的统称，民国以后早就废了这个名号，但它却给了三福一个为村里公众服务的平台，从此，不管有意无意，蚂蚱庙村所有发生的故事都与三福有关联，他是参与者又是见证者，实际上也承担了蚂蚱庙村史的叙述者。当然村里也有与三福无关的故事，但三福没有参与、或者不知道的事情，也就没有被记录在这本小说里。直到1949年蚂蚱庙村建立新的政权，兴邦(另一个新政权在村里的象征)剥夺了三福的约地名号，宣布要把他开除。于是三福就摆烂了名号，消失不见了，村史叙述也到此戛然而止。小说里说他是失踪了，赵琪扶乩算卦，发现三福有两个人影合在一起，看不清楚。此象如以《封神演义》的思路来解读，三福其人，有真作假(贾)，封神者是神，村中人是幻，封神大事完毕，便合二为一，回归真身。如从另一部文学名著《红楼梦》的叙事逻辑来推之，贾三福若红楼梦记录下的民间故事，贾三福是蚂蚱庙村的第一叙事人，作家是隐身于贾三福，利用他的眼睛来观察和叙述村里故事。人的名号也就成了那块无物补天的大石头。大老王深得中国古典小说之美的真谛，此中三昧，如能贯通古



《蚂蚱》  
王兆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